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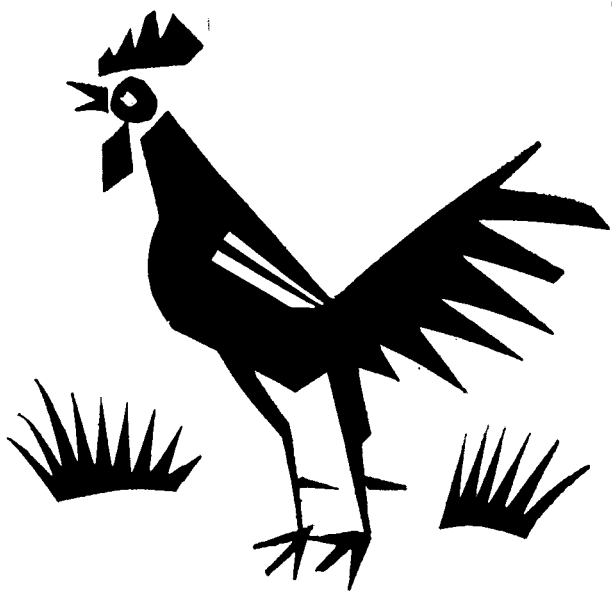
棋王

阿城



棋王

阿城



作家出版社

棋 王

阿 城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第 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960^{1/32} 印张 7.375 插页 6 127,000 字
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书 号: 10248·044 定 价: 1.50 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阿城漫画像

曹力作

小 传

我叫阿城，姓钟。一九八四年开始写东西，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我出生于一九四九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目 录

序……季红真 1

棋 王 25

树 王 78

孩子王 129

会 餐 179

树 桩 186

周 转 194

卧 铺 199

傻 子 205

迷 路 216

序

季红真

阿城冷不丁地冒了出来，简直象一个大故事篓子，从容不迫地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遍地风流》* 诸篇也许以异乡见闻而独放异彩，而《棋王》、《树王》等中篇则都是上个年代知青生活的寻常人事，并不超出普通中国人的想象力。而且，他全部的作品都采用朴素得近于古老的故事叙述方式，平铺直叙，时序自然，情节线索简洁单纯，却带给人无尽的韵味，象一支支旋律平缓而沉积着世代平凡人生内容的古老谣曲，平和中引发着普遍的审美共鸣。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小说以众多的流派和五花八门的形式技巧，令人目不暇接，简直让人疑心作家们穷尽了人类存在的全部状态和审美活动的全部潜能。即使把视野限制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国土

*《遍地风流》系阿城的一组正在陆续发表的系列短篇，未收入这个集子。

上，历史转变时期文学潮头的迭起与表现手法的种种新奇趋向，也足以让人眼花缭乱。生活越来越紧张的节奏，现代人越来越强劲不宁的内心世界，与越来越复杂的小说形式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对应关系。在这一片纷纭繁荣的气象中，阿城的小说却以其朴素的故事和比故事更朴素的叙述方式，开出一片美学新地，争得广大的读者群，这是极不容易的。何况他对表达感知到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自觉努力，本身就代表着—部分青年作家们的共同努力，预示着一个正在兴起的文学流派的成熟。这也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阿城小说引起的普遍反响，可以追寻到其中所浸透的民族文化的浓厚氛围，感觉的丰富、情绪的节制与意旨的含蓄，都在民族民间口语的独到运用中见出风格。俗中见雅，朴拙得近于瘦瘠而又遍布机巧。也可以追寻到生活越来越繁忙的现代接受者，有逆于纷纭变化极不确定的社会生活，寻求内心稳定和精神平衡的审美心理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故事所传达出的，源于现实人生之中，又超于现实人生之上，对世界人生的整体理知。而民族心灵的形式与现代意识的有机融合，则是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

他面对一个逝去的时代，以智者的幽默掩饰起心的沉重，在普通人真切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述

中，升华出对宇宙、自然、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深层的意义构成了阿城小说内在的意韵，带来韵味隽永的美学效果。

—

阿城讲述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尽管有些时候，句法的紧凑，使人称若隐若现于变化明显的叙述节奏中。于是，“我”便是他的作品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形象。即使是《会餐》、《树桩》这些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也可以使人感觉到叙述者与“我”之间的明显联系。

这是一个明显地带着作者自己影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作者艺术化了的自我形象。“我”生长在都市，中学未曾读完，便“文化革命”了。“我”和王一生、倪斌(《棋王》)、来娣、老黑(《孩子王》)、李立(《树王》)们一起，从四面八方走上上山下乡的漫长道路。“我”并不尽有过惊人的壮举，也没有什么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似乎只是被动地随着时代风潮沉浮，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默默地注视领悟着自身以外的广大世界。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个人物不同于其他知青形象的重要特征。

无所作为的时代没有给人们提供正常实践的可能，青春的活力与创造的欲动，或在压抑中死灭，消沉下去；或者在自身寻求发展，导致精神的自我膨胀，反抗那个时代的同时，也深受那个时代的影

响。这两个方面构成我们通常在知青题材的作品中看到的两类形象。而“我”则不同。

在知青生活结束以后，作者回身反顾，不讳言，不虚饰，忠实地记叙着以往生活的真切感受。那曾有过的劳苦困顿、精神的压抑、灵魂深刻的寂寞，以及苦中作乐的欢欣，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感觉中。但自我的存在毕竟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前提，比这全部感觉更丰富的是陌陌的个体人生旅途中遇见的众生相。那出身寒苦始终为衣食困顿着，却终于以其普通人的执拗，完成了一次人生证明的王一生，和活在儿子的记忆中，一生在屈辱贫病中挣扎，以一双弱手折着书页，也翻动着普通人生命史的母亲；那瘦小精悍，沉默而执拗，终因不能顺从盲目的潮流而积郁丧生的肖疙瘩，和他顽皮机灵的儿子六爪；那力大过人却木讷少言，在艰辛的生活中深藏着朴素希望的王七桶，和他憨直早熟，以认真与毅力追求知识的儿子王福；还有那些无名无姓，在荒谬的年代，以其劳动者特有的幽默，在一片迷茫中依然保持着丰富的生活意趣的普通农民们（见《会餐》），都在“我”的经验世界中，构成知青生活不可忘怀的部分。不仅如此，即使那些并不直接与知青生活发生联系的人们，在与“我”人生邂逅的偶然相逢中，也在心灵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那枯老如树桩，却以古老质朴的诗情歌韵，凝聚起一个民族无法扼杀的情感与活力的民间歌者（《树

桩》); 那天性袒露的蒙古族男女骑手(《遍地风流·洗澡》); 那些在赶马帮的闯荡生活中生命张弛激烈的汉子们(《遍地风流·溜索》)……都以各自独特的人生内容, 沉淀在“我”的感觉中, 使“我”有限的生命负载着无限的人生。

于是, 我们便在阿城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叙述方式中, 看见了一种普遍的结构。他以“我”的存在为起点, 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 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断的叙述, 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他笔下的全部故事, 都在“我”一次又一次的认知感悟过程中, 完成着感情与思想的升华。这种圆周式的叙述结构, 是我们理解他作品全部意旨的内在枢机, 而在“我”内外交通的丰富性格中, 则既体现着一种人生态度, 也反映着作者的审美态度。

二

从一己的感觉入手, 忠实地记叙时代限制中人生际遇的真相, 同时, 已不沉溺于个体的苦乐之中, 始终保持着对广大现象世界的丰富兴趣。这反映了阿城所赞许的人生态度。人世近俗, 不耻于言饮食男女, 在这些人类基本的生命活动中, 体察芸芸众生的甘苦, 探索历史沉实的脉搏, 也收取着普遍人生的营养。即使在困苦劳顿中怅惘迷失, 也终于在博大的现象世界的启悟中, 获得豁达的胸襟。

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使作者在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主题中，“寂然凝虚，思接千载”，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对个体人生存在的超越。

那读过的远了与近了、模糊了的书本之间；那在意念中目瞪口呆的项羽、刘邦与站起来的黑脸士兵之间；那刻意追求伟大人格的李立与默默生死、融生命于自然的肖疙瘩之间，升华起绵长的思绪。凝聚着作者对人的理解，也在对自身存在与普通人命运之间深刻的认同意识中，确立了个体人生存在的真实位置与价值。“我”是一个普通的知青，是一个衔接着无数平凡人生的普通人。于是，在时代的限制里，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有了一份正对现实人生的勇气，任何一个微小的现实机遇都使他表现出普通人诚实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在《孩子王》中读到的故事，“我”那时时迟疑着的认真与王福的执著，都源于那走进“白太阳”的王七桶，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支撑艰辛生活的坚韧。

由入世近俗而达到深刻的认同，作者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际遇，既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更不是自命高雅的苛责，是深切的体验，积极的内省。这就使阿城所推崇的人生态度中，把博大的人道精神与现代人的存在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阿城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持有普遍的善意与宽容。

与入世近俗的人生态度相联系的是阿城以体察

与认知为特征的审美态度。他的小说虽多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我”却不一定是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作者经常采用的是旁观的叙述视角。即使是《孩子王》这样叙述者直接参加到事件中的作品，处于故事中心地位的也是王七桶父子。而且，虽然“我”在叙事结构中处于相对稳定的中心地位，但构成他艺术世界丰富内容的，却是活动在“我”的视野中的众多人物。作者以“我”对现象世界的观察，了悟、认知着宇宙人生，入其内而出其外，仰观俯察博取众收。这显然更多地承袭了中国古代静察默观的审美态度。而要达到这种艺术境界，则需要良好的内心修养与自觉的美学追求。只有心沉到底处，灵魂静到极处，才可能溶心于纷纭的大千世界，内外和谐出入自由。古人所谓“陶陶文思、贵在虚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读阿城讲述的故事，每到高潮处，便出现一片静的氛围。王一生坐在空场中央鏖战众敌，“静静的象一块铁”。肖疙瘩坐在巨大的树根上，要以生命阻止李立们砍树，鸟叫声如被阳光罩住，“干干的极短促”，连他说话的声音也“模糊而陌生”，众人冷的感觉烘托着紧张的“静”。李二在赛歌的高潮中猝然倒下，无言的遗憾也让人觉得静如虚空。作者在这一个个虚与静的氛围中，集结起饱满的情绪张力，象宇宙时空般永恒的生命价值的意识，便从平凡有限的人生具象中缓缓升起，暗示出丰富的语

义内容。大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境界。这也正是以体察与认知为目的的审美态度带来的独有效果。

三

应该说这种主要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态度，在近年小说作家们的创作中是不乏成功的先例的。老作家汪曾祺，陕西青年作家贾平凹，都以这种审美态度，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达到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境界。阿城与他们的不同，除了载体选择的明显差异外，前两位作家多侧重具体的伦理关系，以之为媒介升发对人的理想。阿城则并不执意于伦理的形式，而常常深入到特定文化制约中的生命状态。他对细节的写实极少满足社会层次上的典型概括，而更倾向于对现实的超越，达到对世界人生整体的哲学了悟。这是他的创作个性，我们因此而难于以写实文学的一般规律去阐释评价他的作品。

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法。阿城对世界人生的理知不以其局部的认识与劝诫为目的，而通过丰富的感觉与印象，以心与世界的交融达到整体性的把握。

这种整体性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他对世界人生纵的不确定性的敏感。阿城笔下的人物，多有着沉浮动荡的经历。《棋王》中以捡烂纸为生的老头，谈

吐中透露着他早年富足的家世；出身寒苦的王一生则终于以精湛的棋艺名振一方；倪斌对先祖事迹的讲述，“我”的家庭变故；《树王》中由战斗英雄而到被监管地步的肖疙瘩，都以各自的生活经历，折射着人生际遇的多种偶然性。甚至，《峡谷》中那个沉默的骑手，也在静的神秘氛围中，暗示着某种不确定的人生内容。在这些沉浮动荡的人生故事中，阿城并不止于世事无常与荣辱不定的消极感叹，他透过人生世相的变化，测定着个体人生存在的真实位置，在不确定的个体人生命运中摸索着历史人生确定的底蕴。王一生在困顿的生活中实在的人生观念与坚实的人格操守，肖疙瘩沉默强悍的性格中对人对事古朴的信念，王七桶父子在艰辛的生活中磨砺出的执著秉性，那无数的汉子们充满力度的顽勇性格，在阿城的故事里，都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理想，而是衔接着漫长历史的无数微小人生永不泯灭的生命价值。与这种恒定的价值相比，人生外部的荣辱得失显得短暂而微不足道，而浮动在历史表面的帝王将相与埋在历史深层的黑脸士兵之间又孰论优劣！

正是在外部的不确定与内在确定之间，在瞬间的表层价值与永恒的深层价值之间，阿城完成了自己对人的理解，表达着他对平凡人生创造价值的肯定。这使他一再选用“无字棋”、“无字碑”这样的意象，赋予平凡的生命以大的魂魄。且看王一生孤身

坐在棋场中，力克群敌。作者写道：他“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深地陷进去，黑黑地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象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此时，王一生已超越了个体人生的存在，作为人的类象征，汇入历史人生、宇宙生命古老而弥新的旋律中。俗人的乐趣便随着这旋律升腾起来、弥散开去。由微小而至博大，由对人生纵的不确定性的洞悉达到对生命永恒价值的确认，汪曾祺老认为阿城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此一点我以为也足以为证。

尊重每一个微小的人生历程，肯定生命的价值，这使阿城对笔下人物的普遍善意与宽容中，带有人道精神的普遍特征。他在一时一地的人生现状中抽象着人类普遍的苦乐，这常常使人想起罗丹塑造的，那高居于“地狱之门”顶端，注视着众生挣扎的思想者形象。如果说阿城对人的理解带有人类共通的人道理想，那么更体现他感知方式个性特征的，则是东方民族对世界横向有机联系的直觉感悟。这也是阿城艺术地掌握世界整体性的一个特点。

在他的笔下，人不仅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自然的一种生命形式。这个特点，除了有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文化渊源外，显然与作者曾长期生活在边鄙山林，与自然有着直接的生存联系，以及在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中特定人生内容在心理的直觉积淀